

基于语料库的淄博市新移民市民的 方言语音变化研究

[摘 要]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移民，城市移民的语言也因与其它语码接触而发生了变化。本文以淄博市张店区的新移民市民三码人的母方言——沂源方言的语音变化为研究对象，以数据库语言学为研究方法，详细分析了沂源方言的声调、声母和韵母、音节的变化及其扩散机制。本研究不仅揭示了沂源方言语音变化的状态及系统性，同时也探讨了语音变化的不平衡性及背后原因。

[关键词] 城市化；移民；语料库语言学；方言接触；语音变化

Research on Dialect Changes of Zibo New Immigrant Citizens Based on Corpus

Abstract A great many migrants occur in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the dialects of city immigrants undergo changes induced by contact with other cod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honology change of Yiyuan dialect, which is the mother tongue dialect of three code speakers of Zibo new immigrant citizens from Yiyuan county, as our research object, take corpus linguistics as method, specifically analyze changes of tone, *shengmu* and *yunmu* and syllable of Yiyuan dialect and their diffusion mechanisms. This article not only reveals changes' status and system of Yiyuan dialect, but also discusses the changes' imbalance and its cause.

key words urbanization; migrants; corpus linguistics; dialect contact; phonology change

1. 前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内部移民越来越多，大批人口向城市聚集，从而形成了城市原住民、新移民市民和准移民市民共同生活在城市中的状况。如果新移民市民在城市中通过结婚、朋友或者亲戚等方式与原住民建立起高密度和复杂的社会网络，他们会成为母方言、当地方言和普通话三码人。三码人的母方言由于其他两种语码的接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淄博市作为我国北方一个中等城市，其在城市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外部移民大量涌入，城市人口多元化，城市语言多元化的过程。淄博市中的省内、城乡移民是移民主体。本文研究的是从沂源县到淄博市市中心张店区的城市新移民三码人的语音变化，集中关注的是由于与普通话和张店方言的接触而引起的新移民母方言——沂源方言语音的变化，并讨论语音变化的相关机制。

2. 背景

2.1 城市化和移民

根据美国地理学家 Ray. M. Northam (1979) 的“S 模型”理论，我国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就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中间阶段，与城市化进程并行的是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金哲等，1988）。但是由于“城市户口”的限制（Dong, 2009），城市移民身份被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新移民市民”。这类人群拥有城市户口，在工作机会和社会福利方面与当地市民有相对等同的机会。第二类是“准移民市民”。这类人群没有户口，不得不从事建筑、餐馆服务、清洁、家政等低端体力或者服务性质的工作（Dong, 2009）。因此，大体上讲城市中有三种不同身份的居民：城市原住民，新移民市民，和准移民市民。

2.2 淄博市张店区言语社区

本研究的调查工作是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进行的。淄博位于山东省中部，是“全国综合实力50强城市”和“全国投资环境40优城市”之一。张店是强淄博市的中心城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科技和流通中心，城市化水平82.49%¹。2000年，张店区人口达到712,300，其中560,100是注册人口（大体包括城市原住民和新移民市民），剩余的152,200基本上属于准移民市民²。来自淄博市南部沂源县的移民是张店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沂源县位于淄博市最南端，原属临沂地区，1990年划归淄博市

管辖。此后，越来越多的沂源县居民迁移到淄博市尤其是张店区寻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根据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的《山东方言的分区》（1985），山东方言可进一步分为四个次方言：东区东莱片，东区东潍片，西区西鲁片和西区西齐片。张店方言属于西区西齐片，沂源方言属于东区东潍片（参考地图一）。这四个次方言之间既有差别又有相同之处。

3. 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以淄博市新移民市民三码人为研究对象，以他们的母方言——沂源方言的语音变化为主线，分析沂源方言在与普通话和张店方言的接触中，沂源方言语音在声调、声母和韵母、音节等方面变化的具体过程、规律以及音变在词汇中的扩散机制。并通过语言接触结果的不平衡性推测沂源方言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对北方方言不同次方言的接触研究可以看作是关系密切、类型相似的语言的接触实例，同时也是城市化、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接触研究的个案。

4. 方法

4.1 数据收集

数据的收集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观察法、谈话录音法、访谈法和调查问卷，此外，我们还参考了网上论坛的语料，以及《沂源县志》和《张店区志》中关于方言记载的材料。

作者之一在她早期的田野调查中就注意到，长期在张店生活和工作的沂源县移民所说的“沂源方言”和沂源县本地居民所说的沂源方言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大多数沂源当地人都是沂源方言单码人，然而从沂源县迁移至张店的许多新移民市民则是三码人。由此，我们推想两种“沂源方言”之间的差异是方言接触引起的。在观察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对谈话进行了录音，希望获得翔实的语料来证明或者证伪我们的假设。谈话录音有三种来源。第一个来源主要是对新移民市民的七段访谈录音，我们还收集了新移民市民经常使用的网上论坛“淄博旻晃”³上的一些语料。这两部分共同组

成了数据库一，也是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我们称之为“接触后的沂源方言”。谈话录音的第二个来源，是对沂源县当地人的八段谈话录音，这些谈话是在家庭、餐馆、公交车站录制的。这些对话组成了数据库二，可被称为“沂源县当地方言”。谈话录音的第三个来源，即数据库三，包含了七段张店当地人使用张店方言的谈话录音。我们没有单独设立普通话数据库，因为第一作者熟悉普通话的语音系统，文献中也有详细的记录。

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和发放调查问卷，我们得到了被调查人方言使用背景和语言态度的基本情况。所有的新移民市民被调查人都表示他们能说三种语码，虽然每种语码的熟练程度不同。大体来说，他们可以说地道的沂源方言，比较好的普通话，不太好的张店方言。在问卷中，我们采用了 Osgood (1957) 的“语义微分量法”来测试被调查人的语言态度。一般来说，被调查人对普通话都持有积极的态度，认为说好普通话很有必要。

4.2 研究者和被调查人

本文的第一作者是录音中的说话者之一，她的母方言是沂源方言，同时她的普通话的水平很高，达到二级甲等。她基本不会说张店方言，但是能模仿一些张店方言。本研究中有三类被调查人：来自沂源县的张店新移民市民，张店当地人和沂源县当地人。

新移民市民（数据库一中的被调查人）：六位被调查人都是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他们出生在沂源县，但已经在张店工作、生活十年以上，有张店城市户口。我们选择的新移民市民被调查人均与张店当地人建立起了高密度、复杂的社会网络。他们的语言深受张店方言和普通话的影响，他们都是三码人。

沂源县当地人（数据库二中的被调查人）：研究中的四位被试也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他们出生在沂源县，能说地道的沂源方言。他们能听懂普通话，但是说不好。

张店当地人（数据库三中的被调查人）：三位张店当地人被试也是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出生在张店区，张店方言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能听懂普通话，但是很不熟练。

4.3 语料分析程序

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音系上，因为音系是方言接触后发生变化的主要领域。我们采用六个步骤分析数据：

第一步：我们通过数据库二和三，同时参考《沂源县志》和《张店区志》，整理出沂源方言和张店方言的音系。对于普通话的音系，我们参考了《现代汉语》（修订本）中的介绍（王理嘉、陆俭明等，2006）。

第二步：我们整理出沂源方言音系、张店方言音系和普通话音系的不同之处。

第三步：我们将数据库一中谈话录音转录为三个版本：汉字版，拼音版和国际音标版；此外，我们列出了相对应的沂源方言版和张店方言版。谈话录音转录包括了每个音节的声调。声调是汉语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方言接触引起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步：我们让三种被试人员核查我们的转录并修订。

第五步：我们进一步比较数据库一和数据库二，找出新移民市民谈话中所说的沂源方言和沂源县当地人说的沂源方言的差别，特别是在第二步中没有发现的不同。

第六步：我们将新移民市民的语言变化与三种源语码中的相对应的部分进行比较，进一步探索接触机制在方言接触中的作用。

4. 分析结果

4.1 声调的接触结果和变化

通过对数据库一中的声调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数据库一中的声调共有五个调类，包含了源语码中的各种调值(源语码声调系统见表一)。我们根据源语码的调类名称，将五个调类标示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下面我们进一步阐述数据库一中的声调特点。

表格一：三种源语码的声调系统

源语码的声调系统				
沂源方言	阴平 213	上声 44		去声 41
张店方言	平声 213	上声 55		去声 31 入声 33
普通话	阴平 55	阳平 35	上声 214	去声 51

首先，数据库一中的大多数调类都与源语码系统中的调类整齐对应，很少有跨类配错的情况。数据库一中的阴平调类的字或者对应沂源方言中的阴平 213，张店方言中

的平声 213，或者对应普通话中的阴平 55。数据库一中的阳平调类的字或者对应沂源方言中的上声 44，或者对应张店方言中的上声 55，或者对应普通话中的阳平 35。数据库一中的上声调类的字或者对应沂源方言中的上声 44，或者对应张店方言中的上声 55（事实上，44 和 55 不容易区分），或者对应普通话中的上声 214（事实上，数据库一中的降升调是 213）。数据库一中的去声调类的字或者对应沂源方言中的去声 41，张店方言中的去声 31，或者普通话中的去声 51（尽管数据库一中的去声并没有普通话中的去声降调那么明显）。数据库一中的入声字很少，入声字在沂源方言和普通话中已经归并到其他的调类中，新移民市民被试把张店方言中的部分入声字按照其他调类来读了。

第二，从数据库一中出现的调值比例来看，数据库一中的音节的声调对源语码尤其是方言和普通话声调的选择，并不平衡。我们从数据库一中随机抽取了三十个阴平字，三十个阳平字，三十个上声字，建立起一个小型样本，来检测一下数据库一中对方言和普通话声调的选择比率。我们忽略了去声字和入声字。忽略去声字是因为三种源语码中的去声调值、调型类似，不容易区分它们；忽略入声字是因为数据库一中的入声字很少，无法纳入样本中和其他调类的字一并计算。沂源方言和张店方言声调的字被放在一起考虑，因为它们的调值在阴平、阳平、上声三种调类（实际上，阳平和上声已经合并）中的调值相似，不容易区分。样本中三个调类的字选择方言和普通话声调的比率见表格二。

表格二：样本中方言和普通话调值的比率				
调类	源语码	调值	比率 (%)	汉字示例
阴平	沂源或张店方言	213/213	71.4	非，需，他，般，家
	普通话	55	28.6	一，应，该，我，通
阳平	沂源或张店方言	44/55	66.8	甜，如，觉，言，咱
	普通话	35	33.2	来，除，服，人，员
上声	沂源或张店方言	44/55	41.3	单，当，也，吃，种
	普通话	213	58.7	很，买，挺，张，本

从上述比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一般来说，当新移民市民被调查者说沂源方言时，他们倾向于保持方言声调系统。然而，他们的沂源方言声调系统已经受到了张店方言特别是普通话的深刻影响。表格四恰恰体现了沂源方言的变异程度。

(2) 样本中的每一个调类向普通话顺应的程度不同。上声调从方言中的 44/55 顺应到普通话的 214（实际上多是 213）的顺应程度是最高的；阴平的顺应程度是最低的；阳平的顺应程度居中。213 或者 214 的调型在阴平和上声调类中具有一种很强的吸引力，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拉平”作用 (Trudgill, 1986)。

Trudgill 在《接触中的方言》（1986）一书中提出，拉平是指标记项的减少或磨损，而标记项是指那些“不经常的或者极少使用的”语言成分。Trudgill 进一步解释说“拉平的确可能在大多数新方言形成环境中起重要作用”。拉平作用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第三种略）：第一种，拉平作用会选择源语码中最常用的形式，即具有最小社会、语言标记性的语言成分；第二种，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较少出现的形式则会在新方言中保留下来，特别是当这种语言形式的少数派比其他的语言形式更加简短的情况（Trudgill, 1986）。

方言中的 213 和普通话中的 214 调型相似，都是“降升”调。降升调是源语码声调系统中的一个经常出现的调型，因此具有拉平优势。这不仅解释了方言中上声调标准化程度最高的原因（58.7%），降升调的拉平作用也有助于方言中的阴平调抵制标准化进程（28.6%），降升调的拉平作用甚至导致了跨类配错的情况。对于源语码声调系统中阳平调的三个调值 44/55/35，我们发现被调查人有时并不选择该调类中的任何一个调值，而是跨类选择 213。例如：“觉”在沂源方言中的读音是[tɕyǝ44]；在张店方言中的读音是[tɕyǝ55]；在普通话中的读音是[tɕyǝ35]，但是在数据库一中它多次被读作[tɕyǝ213]。去声调类中的 41/31/51 也有类似的情况。

除了最经常使用的语言形式在拉平中胜出外，在数据库一中，我们还发现了较少使用的形式在新方言中保留下来，例如阳平调的拉平作用，见表格三中的示例。

表格三：阳平调 35 的拉平作用示例

数据库一中的	数据库二中的沂源	数据库三中的张店	普通话声调
--------	----------	----------	-------

例字声调	方言声调	方言声调	
Shu35 (书)	shu213	shu213	shu55
Biao35 (标)	biao213	biao213	biao55
jie35 (截)	jie213	jie213	jie55
Bu35 (不)	Bu41	bu31	bu51
Pu35 (普)	Pu44	pu55	pu214
ji35 (给)	Ji44	ji55	ji214

从表格三我们得知，在源语码的声调系统中，调值 35 仅仅出现在普通话的阳平调中，因此它是源语码声调系统中的少数形式。表格五显示，数据库一中的例字并没有选用源方言中的任何一个调值，而是跨类选择了普通话中的阳平调调值 35。为什么 35 如此“有吸引力” (Johanson 2002)，甚至能突破 214/213 调值的拉平作用而出现在新方言中？Trudgill (1986) 提到形式的凸显性或者“语言上的标记性”会在方言混合中有一定的优势。在源语码的声调系统中，声调调型以平调、曲折调、降调为主，35 升调调型可以看作是源语码声调系统中的一个显性标记，因此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在本章节中，我们分析了声调系统的接触结果。如果从沂源方言变化的角度看这些结果，我们发现数据库一中沂源方言声调的每一个调类都有不同的变体。如果我们把与数据库二中的变体相同的变体叫做“未变化的成分”，把受到其它源语码影响的新变体叫做“已经变化变化的成分”。很明显，未变体的变体与已变变体并存，即新移民市民的沂源方言声调系统正在经历“由接触引起的变化/ongoing contact-induced change” (Dogruoz & Backus, 2009)。

4.2 声母和韵母的接触结果和变化

当源语码中的声母和韵母不同的时候，那话者在语言接触中就会遇到变体选择的问题。由于声母和韵母的不同主要是由辅音和元音的不同引起的，本小节我们主要分析方言接触中由辅音和元音的差异性而引起的变化。在对数据库进行分析、以及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整理出了源语码系统中辅音和元音的差异，见表格四。

表格四：沂源方言、张店方言和普通话辅音和元音的差异

	辅音						元音					
沂源方言	ø	tø	tøh	ø	ŋ	l	o	ə	ε	au	an	ən
张店方言	v	ts	tsh	s	ŋ	l	ə	ə	ε	ɔ	ã	ə̃

普通 话	ø	ts	tsh	s	ø	ø	ə	ə̃	ai	au	an	ən
---------	---	----	-----	---	---	---	---	----	----	----	----	----

针对表格四中列出的辅音和元音的差异性音位，我们对数据库一中的音系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了以下现象：有些沂源方言音位保留在了数据库一中，有些沂源方言音位与张店方言音位或普通话音位并存于数据库一中，有些沂源方言音位已经被张店方言音位或普通话音位代替。具体来讲，数据库一中存在的差异性音位变体的详细情况如下：（1）处于“未变化的特点/ unchanged features/UF”状态的沂源方言音位：-tə, -təh, -ə; -ə, -ε; （2）处于“正在变化的特点/ on-going change/OC”状态的沂源方言音位：-ø, -ŋ, -l; -au, -an, -ən; （3）处于“已经变化的特点/ changed features/CF”状态的沂源方言音位：-o。很明显，沂源方言中的辅音和元音也受到了普通话和方言的深刻影响，并处于变化之中。

4.3 音节的接触结果和变化

我们发现数据库一中的沂源方言在音节搭配方面也在经历很多变化，例如：

（1）在数据库二中，声母[l]可以和韵母[uei]组合，但是并不能跟[ei]组合。例如：“泪、雷、类、累、垒”等字在沂源县当地方言中的声韵母组合是[luei]。而这些字在普通话中的声韵组合是[lei]。由于受到普通话的影响，一些新移民市民已经开始使用普通话的发音。不过，[luei]和[lei]两种组合并存于数据库一中，即沂源方言中的这组声韵组合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正在变化之中，不过变化也没有完成。

（2）我们在数据库一中发现了许多混合音节。例如，数据库一中“如”、“还”、“没”等字的音节分别是[lu35]、[han35]、[mu35]，这些音节的声母和韵母与数据库二中的沂源县当地方言读音一样，但是声调却与普通话中的读音一样。再如，数据库一中“割”、“白”、“农”等字的音节分别是[ke213]、[bai44]、[nong44]，这些音节中的声韵母和普通话中的读音是相同的，但是声调却与数据库二中的沂源当地方言中的声调相同。

（3）不同的音节变体或者或者音节组合变体并存于数据库一中。如：数据库一中，表示个人意见的、来自三种源语码的三个词语并存：沂源当地方言形式“觉了[tɕyə44lao]”，张店当地方言形式“觉[tɕyə 55]”，普通话形式“觉着[tɕyə35tɕə]/觉得

[tɕyǝ35tə]”。此外，还有一个混合形式“觉着[tɕyǝ 213tɕau]”，其词形来自普通话，读音上则是变异形式和方言形式的混合。其中“觉”的读音来自于拉平作用形成的变异，即说话者没有选择沂源方言的上声调的 44，张店方言的上声调 55，也没有选择普通话的 35，而是跨类选择了具有“多数”特点的降升调 213。“着”的读音是方言读音“zhao”，不是普通话读音“zhe”。

声母和韵母及其组合的不稳定状态，以及不同变体的并存，表明沂源方言中的音节正处于进行变化之中。

4.4 语音变化的扩散机制探讨

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阐述了沂源方言声调、声母和韵母以及音节的变化，本小节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由接触引起的正在进行的语音扩散的规律。我们发现正在进行的语音变化的分布与词语的特点紧密相连。声调、声母和韵母、音节结构方面的不同变体，相比较而言，沂源方言、张店方言变体经常出现在具有口语风格的词语中，而普通话变体则经常出现在具有书面语或者较正式的风格词语中。下面举例说明这种分布特点，并再次使用 4.1 章节的样本。以声调为例，我们发现包含普通话声调的将近 80%的词语其风格都较书面化或者较正式；而包含方言声调的近 73%的词语其都具有口语化风格。根据汪平（1990）的普通话习得困难度系数，在日常谈话中频繁使用的语言成分不容易改变。我们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与方言相比，普通话更正式，普通话对方言的渗透开始于影响方言中那些带有书面语风格的词语。因此，沂源方言语音的变化首先开始于具有较正式语体的词语；然后逐渐扩散到常用词、口语词。当语音变化在这些常用词语中扩散开的时候，语音变化在词汇中的扩散就达到了后期阶段。我们的研究表明沂源方言中的音系变化遵循了词汇扩散机制（Wang, William S.-Y. and C.-C. Cheng, 1977）。

5. 讨论

我们对淄博市张店的新移民市民沂源方言语音的分析表明，沂源方言语音受到了张店方言和普通话的深刻影响，正在经历一系列的变化。然而普通话和张店方言作为沂源方言的两种接触语码，对沂源方言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普通话是我国的官方语言，也是汉语的权威语言变体，它不仅是工作、教育和媒体用语，也象征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教育背景和个人能力。而方言，不论是母方言还是当地方言，则多是家庭和

朋友用语，并且是文化水平低、土气的象征。在现代的社会中，普通话与方言相比而言，在实用性和功利性层面上具有更大的优势。这种普通话和方言的不对等性，在本项研究中的反映就是，普通话与张店方言相比，普通话对沂源方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新移民市民的沂源方言中有更多的普通话痕迹。方言接触结果的不对称性，从微观的角度讲，反映了语言系统内部的不对称性；从中观的角度讲，反映了语言地位和语言态度的不对称性；从宏观的角度讲，则反映了城市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城乡发展的不对称性。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沂源方言语音变化与不同被调查人的相关性分布。沂源方言语音受普通话影响的程度通常与被调查人的年龄、教育和职业密切相关。如果新移民市民年龄越小，有更好的教育背景，在工作中使用更多的普通话，那么在他们的“沂源方言”受普通话的影响越强烈，反之，他们的沂源方言受普通话的影响越小。新移民市民沂源方言中的张店方言成分则与被调查人在张店工作、生活的时间长短，以及他们与张店当地人建立的社会网络的密度、复连度有关。他们在张店生活的时间越长，他们与张店当地人建立的社会网络密度越大、复连度越高，他们的沂源方言受张店方言的影响越大。反之，影响则越小。我们设想如果沂源方言被新移民市民的后代继承下来，那么沂源方言的语音变化将会持续、深入、扩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相当部分的二代移民似乎并不情愿学习父母辈的母方言，于是成了普通话和当地方言双码人，甚至成了只会说普通话的“无方言族”（劲松、马璇，2012）。然而，母方言不会在移民二代中很快消失。首先，部分移民的二代在小时候被说母方言的祖父母照顾，因此他们至少“被动熟悉”（Thomason, 2001）了家乡母方言。其次，当第二代移民长大成人、完成学校教育、回归社会和家庭后，为了体现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感，也为了增强与家庭的凝聚力，他们的语言可能会出现向家乡母方言的回归。

[注释]

1. 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68628.htm>
2. 见第五次张店区人口普查：<http://whiledo.com/geo/370303/people0/>
3. 见淄博旻晃论坛：<http://bbs.zbgl.net/forum-494-1.html>

[参考文献]

- [1]A. Seza Dogruoz&Ad. Backus, 2009, Innovative constructions in Dutch Turkish: An assessment of ongoing contact-induced change,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12(1),41-63.
- [2]Chambers, J. and Hardwick, M.(1985) *Dialect homogeneity and incipient variation*. Sheffield Working Paper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
- [3]Chambers,J. and Trudgill, P. (1980) *Dialectology*.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Dong, Jie, 2009, *The making of migrant identities in Beijing, scale, discourse, and diversity*,
- [5]Dulay H. C, Burtak, Krashen S. 1982, *Language Tw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Eckman F. ,1977, *Markedness and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Language learning*, 27:315-30.
- [7]Ferguson,C.1959, Diglossia. *Word*15, 325-40.
- [8]Gumperz, J.J. and Hernandez,E.1969, Cognitive aspects of bilingual communication. *Working Paper*28, Language Behaviour Research Laboratory, Berkeley.
- [9]Johanson, L. 2002, *Structural factors in Turkic language contacts*.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 [10]J. K. Chambers, Peter Trudgill, Natalie Schilling-Estes, 2008,Linguistic Outcomes of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Oxford: Wiley-Blackwell Publishers.
- [11]Labov,1972,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Oxford:Blackwell.
- [12]Myers-Scotton Carol, 2002, *Contact linguistics: bilingual encounters and grammatical outcome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3]Michael G. Clyne,2003, *Dynamics of Language Contact: English and Immigrant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4]Milroy,L,1987, *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s*. 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
- [15]Selinker,L.1972, *Interlanguage*. *IRAL*10.209-231
- [16]Northam, Ray M.1979,*Urban Geography* (2nd ed.) ,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Inc.
- [17]Osgood, C.E.(1957) A behavioristic analysis of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as cognitive phenomenon (pp.75-118) In J. Bruner (E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cogn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8]Sarab G.Thomason,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19]Trudgill, P.1986, *Dialect in Contact*.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20]Wang, William S.-Y. and C.-C. Cheng. (1977). Implementation of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Shaungfeng Chinese case. In W. S-Y. Wang (ed.), *The lexicon in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Hague: Mouton.
- [21]Weinreich,U.(1953) *Language in contact*. New York: Linguistic Circle.
- [22]陈建伟. 临沂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 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D], 2008.

- [23]陈亚川.“地方普通话”的性质特征及其他[J].世界汉语教学,1991,(1).
- [24]傅灵.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以长沙、上海、武汉为例[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 [25]高山.“武汉普通话”语音考察.上海: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D],2006.
- [26]郭凤岚.宣化方言变异与变化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 [27]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 [28]江获.论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式[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
- [29]江燕.南昌话和普通话接触研究[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 [30]金哲等主编.当代新术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31]劲松,马璇.太原非方言族对当地方言使用 and 发展的影响[J],待刊.
- [32]李静静.基于语料库的上海话—普通话中介音韵母特征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 [33]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中国语言地图集[M].香港: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1987.
- [34]牛余星主编.张店区志[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 [35]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山东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5(04).
- [36]沈家煊.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01).
- [37]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 [38]王理嘉、陆俭明等编著.现代汉语(重排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39]汪平.上海口音普通话初探[J].语言研究,1990(1).
- [40]汪山春.基于语料库的上海话—普通话中介音声调特征及声韵调关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 [41]王学彦主编.沂源县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6.
- [42]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